

盛唐气象里的中国力量

钟 芳

看点 提起唐朝，很多人的脑海里便会浮现起长安万国来朝、丝路驼铃不绝的恢宏图景。但除去诗词史书铺陈的浪漫想象，真实的盛唐社会又有着怎样丰富的样貌？

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著的《盛世之光：文物里的盛唐气象》，以百余件珍贵文物为切入点，串联起都城营建、制度运行、军事防御、经贸往来、文化风貌与民间烟火，铺展出一幅兼具宏大格局与人间温度的盛唐历史长卷。



书中所选文物品类丰富，既有金银重器、唐三彩、墓室壁画，也有文书残卷、银饼器物，覆盖朝堂、边关、市井各个层面，百余件珍贵文物完成了对盛唐多维度的全景还原。

作者把这些文物放置于它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加以解读，从长安城布局相关遗存，让读者能够窥见这座世界性大都会的城市格局，感受八方辐辏的都市气象。律法文书残卷，从一个侧面揭开了唐代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，让抽象的典章制度变得具体可感。金银器、庸调银饼等实物，静谧无声地记录着当时赋税制度、手工业水平与商贸流通的真实面貌。而丝路相关文物，则直观呈现出丝绸之路上物资流转、文明互鉴的热闹景象。

与此同时，唐墓壁画、仕女俑、乐舞陶俑等器物，又把视角下沉到尘世烟火，描摹出贵族宴饮、乐舞游赏、市井起居的人间百态。朝堂的制度建构、边疆的军事布防，跨国贸易交流、百姓的饮食起居，多个板块彼此呼应，共同拼凑出完整立体的盛唐社会图景。

此外，书中没有把文物做成简单的图录注解，而是注重文物之间的互证。一件金银器皿，既可以从中看到工艺成就，又能关联丝路贸易的往来。一张壁画，既能研究绘画技法，又可还原唐人的礼仪风俗与生活习惯。书中诸多文物相互参照，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疏漏，让历史叙述摆脱了单一史书叙事的局限，让读者从中看到盛唐既有宏大的国家叙事，

也有鲜活生动的社会细节。

这些文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盛唐气象的有力载体，首先在于它们是时代真实留存下来的物质印记，是历史现场直接的物证。

诗文典籍是文人的记录与抒发，难免带有主观渲染，而文物则是唐人亲手制造、使用、留存下来的实物。器物的造型、工艺、纹饰、铭文，都是那个时代国力、审美、社会风气无声的表达。

金银器精巧繁复的工艺，反映出手工业技术的高度成熟，背后依托的是强盛国力带来的物质基础。唐三彩雄浑饱满的造型、绚烂奔放的色彩，映照出唐人开阔自信的审美取向。那些融合异域纹样的器物，中原传统技法与外来文化元素交织共存，恰恰印证了大唐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的时代胸襟，印证出万国衣冠汇聚长安的历史事实。而外来的宝石、异域的纹样经由丝路传入中原后，被大唐工匠吸纳改造，化为本土器物的装饰元素，这并非简单的模仿照搬，而是强大文明自信之下的吸收与再造，也是文物区别于文字描述最直观的地方。

这批文物兼顾宏大格局与个体温度，既记录王朝的高光时刻，也留存普通人的生活痕迹。

本书选取的文物，既有代表国家力

量的重器，也有反映民间生活的物件。透过陶俑、壁画，我们既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、商人、乐工的身影，也能一窥唐人舒展自信的精神风貌。盛唐气象，从来不只是帝王的文治武功，更是整个社会奋发向上的气质呈现。那些开放包容、自信从容，不仅体现在国家对外交往之中，也渗透在百姓衣食住行、审美趣味的方方面面，这些精神特质，全部沉淀在一件件文物之上。

这本书的可贵之处，还在于它打通了器物表象与精神内核的关联。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文物欣赏只停留在赞叹工艺精美，却忽略了器物背后承载的文明密码。而本书则带领读者读懂了文物背后的制度优势、文化底气与民族性格。透过一件件文物遗存，让我们读懂了盛唐并非凭空降临的繁华，而是建立在完备的制度、发达的经济、开放的文化心态之上。强大却不封闭，繁盛而不失包容，这正是中华文明在唐代呈现出的显著特征。当然，编者并不刻意渲染盛唐的光环，书中同样借助部分文物遗存，客观呈现出盛世之下潜藏的社会矛盾，让读者明白盛世并非完美无瑕，繁华背后同样藏着时代的局限，这种客观的解读，也让全书的历史观显得更加理性公允。

回望千年前的大唐，阅读这些来自历史现场的文物，不只是追忆一段逝去的辉煌，也是为当代寻找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文物留存的，不只是唐代的艺术审美，更是中华文明坚韧从容的精神底色。翻开《盛世之光：文物里的盛唐气象》，让我们跟随一件件国宝重返大唐，在器物的微光之中，去领略真正的盛唐气象吧。

消失在街巷的读书聚所

介子平

读书之人与不读书之人，生活在同一城市空间，读书人逛街，绕不开书店。逛书店的习惯起于何时？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；止于何时？掐指算来，已是许久。

分类的小书店在进货时，已替你学术守门，精心筛选。步入其内，品种未必多，却让人流连忘返。店面虽小，然想读的书就在手边，挑攘之间，坐店翻书，架上的书翻阅率真的高，以致书角微卷，书口污渍。不买也可以，重要的是你发现了它，只要来了，便不虚此行，这或许就是其价值所在。

书店是读书人的原点，小书店是那个时代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，这里从不说教，只引你思考。书不仅可读，还是读书人的炫富挂件，当年拥

有某本书时的心情，也是一桩故事。买到书后，会产生一种读过的幻觉，内容已内化为自己的知识。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，吾道不孤，意气相投者，互为书友，这样的交流聚所，自然非小书店莫属。老板既是卖书人，也是读书人，既是义理沉着的讲席，也是倾耳注目的听众，主客无间，亦庄亦谐，店内皆同学，说话之间，天已二更。米可学，道需悟，虽有所思，而不至深，也就有了钉与锤、鸡与蛋之争。广博且包容，直率又内敛，人员未必优秀，语言未必优质，好在面红耳赤，奋掷麈尾，均在顾及体面的理性范畴。书不单单是信息承载的工具，我起初阅读系统的养成，便得益于彼此间的读书心得，且在与人交

流、自我表达中生成智识。小书店培养读书人，读书人反哺小书店，这个闭环很良性。

书店的地理位置，潜藏着特定的商业逻辑。其以图书为核心的生活美学空间，选品的第一功能，不在填充货架，而在确立文化身份，并完成对同好的筛选。且不时突破卖书人的身份局限，以读书会、主题征稿、众筹出版的形式，无意间链接起作者、读者与出版机构，参与到内容生产环节，影响力延伸到了出版产业链上游，完成了从文化消费终端，到内容生产源头的角色转变。

小书店的消失，是不知不觉中的变化，有着回不去的过去。为读者筛选品种的小书店，最终被新的商业模

式筛选掉了。以为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，实则经营半世，不脱柴米油盐。故地重游，人已老去，每一本买到的书背后，都曾有过一个故事，还依稀记得。书籍内容的重要性，超乎其作为“物性”，但纸张的质感、装帧的美感，以及翻页的手感，依旧给人带来一些真实感。以前的生活并未消失，只是变成了少数人的选择。书仍有人读，只是购书的方式变了。董桥说：“书店再小还是书店，是网络时代中的一座风雨长廊，凝视蔽蔽的人文古道，难舍劫后的万卷斜阳。”

情怀一时有，岂能抵得过市值规律？昔年购书处，树高已三丈，我辈复临，精神回溯一番后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女子越剧的百年突围

尤 鉴

■提示

占领上海市场形成全新剧种

越剧的前身是嵊县一带的“落地唱书”，后发展为“小歌班”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女子越剧迅速占领上海演出市场，形成中国戏曲史上罕见的以女性演员为主体的剧种形态。姜进指出，这一变化并非偶然。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和商业文化中心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演出环境与公共空间；市民阶层对通俗情感表达的需求，则为女演员的登场准备了市场条件。

书中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：女演员并非只是被观看的“角儿”，她们还是具有市场号召力和文化生产能力的参与者。她们凭借清新细腻的表演风格，吸引了大批观众，成为都市女性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她们教育程度低，却能在舞台上演绎复杂的世情与人性；她们没有背景，却以“女子文戏”的名义在都市文化中站稳脚跟。这种文化现象本身，已经折射出当时上海都市文化中女性力量的崛起。

书中追溯了这些来自浙江农村的姑娘，在电影艺术的影响下成功将越剧塑造成一种新兴现代戏曲形式，从而成为上海最具人气的剧种之一。姜进没有把这一过程浪漫化，而是用扎实的史料告诉读者：舞台中央的位置，从来不是被赐予的，而是被争取来的。

从通俗文艺成长为严肃艺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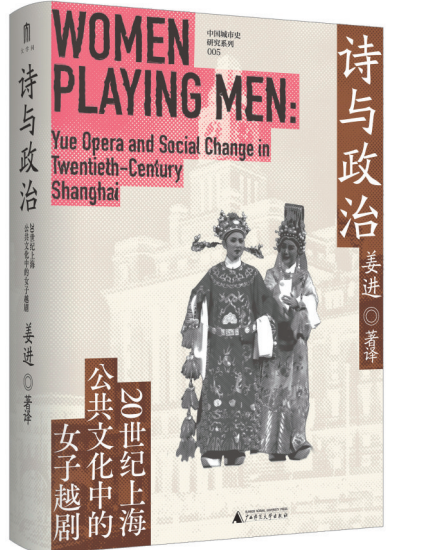
梁祝化蝶、红楼绝唱之所以能打动

热播电视剧《主角》中，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娃一路跌跌撞撞走向舞台中央，她的成长令无数观众动容。如果把镜头摇回100年前，一群来自浙江嵊县山村的乡下姑娘，也曾走过相似的道路：她们大多不识字，起初不被看好，却从乡间草台班一路唱到上海大舞台，在20世纪的都市文化中硬生生闯出一片天地。

姜进教授著作《诗与政治：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》，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系统梳理与深入解读。全书将女子越剧置于上海公共文化的演变之下，既写舞台上的诗意与风流，也写舞台下的时代与变迁，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城市、社会与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。

几代观众，在于它们传递了婚姻自主、人格尊严与真情至性的现代观念。姜进认为，越剧的“诗”并非逃避现实，它以抒情的唱腔、细腻的表演和才子佳人的叙事，在新旧交替的都市中完成了一种情感启蒙。女演员在舞台上塑造深情、坚韧、敢于追求幸福的女性形象，也在舞台下逐步改写自己的人生脚本。可以说，越剧舞台上的爱情故事，参与重塑了现代中国人的爱情与婚姻观念；而演员的现实奋斗，则构成了另一重意义上的“改命”。

更多的越剧演员选择了与偏见与困境抗争，比如袁雪芬等演员倡导越剧改革，与进步知识分子合作，创排新戏，努力摆脱戏院老板的支配，仿效电影和话剧引



入编剧、导演制度。舞台上，《梁祝》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等经典被不断打磨，成为越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随着表现爱国主义的剧目增加，越剧突破通俗文艺的界限，贴上了严肃艺术的标签。1938年，演员们热情邀请文化人加盟，将《花木兰》搬上了越剧舞台。

从地方剧种成长为全国性剧种

孤岛时期的上海，越剧在夹缝中继续改良发展。袁雪芬、尹桂芳等10位演员联合义演《山河恋》，成为越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

1946年《祥林嫂》的上演，更让越剧从才子佳人的抒情传统中生长出深广的

社会关怀，引发巨大反响。鲁迅作品的政治敏感度高，舞台表演很难传达出其中丰富的内涵，因此很少被改编成剧本，越剧《祥林嫂》是将鲁迅小说搬上舞台的首次尝试。书中描述：1946年5月的一天晚上，根据鲁迅的短篇小说《祝福》改编的越剧新戏《祥林嫂》的彩排即将开始。二楼看台上坐满了知名左翼文人和剧作家。越剧自诞生以来，第一次引起了文化知识群体的如此关注。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际，鲁迅的作品也因此更具政治敏感性。在国民党的监控下，几乎不可能将鲁迅作品搬上舞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女子越剧这个专门以“爱情戏”吸引观众、看上去毫无政治意义的地方戏，却做了左翼文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。田汉等人原本只是出于对鲁迅的尊敬，应鲁迅遗孀许广平之邀而来，并不指望如越剧这般的地方戏能够演好鲁迅的作品。不承想，越剧女演员们居然能够如此贴切地演绎《祝福》。田汉对演出大为赞赏，在中场幕落时连连点头说：“这是生活的，人情的，不错的，有道理的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戏曲改革和院团体制建设中，越剧完成了从旧戏班到现代剧团的转型。越剧女演员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，参与整理传统剧目、创编现代戏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红楼梦》等作品被搬上银幕，产生全国性影响，越剧也因此从地方剧种成长为具有广泛观众基础的大剧种。越剧的抒情传统没有消失，并在新的文化体制中获得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。女演员作为创作主体，也从舞台中央走向了文化建设的前沿。

书市观澜

微观空间史 更具选题辨识度

姚雪痕

过去，王朝叙事、城市通史类读物长期占据主流，而今，历史书写的目光正在从总体叙事框架转向微观地方切片，以单一空间作为研究锚点的微观空间史著作持续涌现。相较于泛泛铺陈古今变迁的城市通史，一条街巷、一片工人社区、一处市井公共空间，往往具备更强的选题辨识度。地方文史出版也随之跳出旧志整理模式，从辑录碑刻、人物、掌故转向带有明确理论框架的地方社会史写作。

“尺度下沉”，是这类读物最鲜明的特征。写作者主动放弃包罗万象的通史叙事，转而将研究视野锁定在街巷、茶馆、边境地带、工厂社区等可感知、可落地的微观地理单元，把微小空间视作透视时代变迁的历史透镜，依托一方土地的变迁，折射数百年间政权更迭、社会改造与人口流动的历史进程。徐锦江《愚园路传（1860—2025）：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空间变迁》（1860—2025）：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空间变迁》同样遵循这一逻辑，以上海愚园路一条马路为中心，将租界开辟、孤岛岁月、社区改造、商业化更新浓缩于同一条街道的空间演变之中。

伴随尺度下沉，历史书写的重心也从传统的“事件史”转向“空间与社会结构史”。传统事件史写作习惯于以时间为轴，记录战争、朝代更迭等标志性事件；微观空间史则阐释空间并非单纯的物理载体，权力、制度、社会关系不断塑造空间形态，空间反过来改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这类作品普遍采用长时段叙事，格外重视空间的层叠性，时间上常常跨越数百年，描摹同一空间之上多层历史的叠加烙印，旧政权治理、社会主义改造、市场化浪潮、当代城市更新……不同时代的痕迹沉淀在同一片街巷土地上。

与此同时，学术专著向非虚构化、故事化转型，学科边界日渐模糊，“学术大众化”成为这类读物的共性。传统史学专著重考据、重论证，叙事晦涩，受众局限性大；新一代微观空间著作，保留严谨的理论框架与档案考据基础，同时大量增添人物故事、生活细节，辅以老照片、地图、影像插图，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，面向广大普通文史读者。《平凉路 2767 弄：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》以大量工人原住民口述史料为核心，把社区制度变迁转化为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。非虚构作品反向吸收空间史的问题意识，如白嵩《欢迎再来》以鞍山灵山老工业区社区为书写对象，依托口述纪实呈现东北工业社区的兴衰，虽然不属于严格的学术专著，但其以社区空间承载时代变迁的思路，与微观空间史形成呼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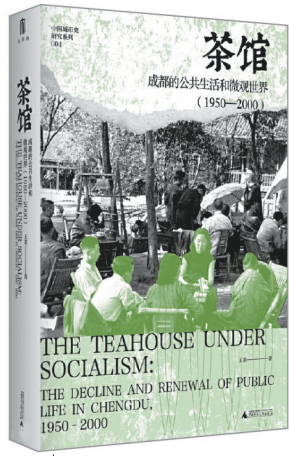
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地方切片，并非历史写作对时代全景的回避，而是换了一副观察世界的透镜。以街巷、社区、场所为载体，将历史落地为普通人的衣食起居，这一写作思路证明：地方文史不必困于旧志整理，历史读物也无须只写王朝兴衰。扎根方寸空间，打捞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社群记忆，也能生长出兼具学术深度、人文温度与市场辨识度的优质作品。

■荐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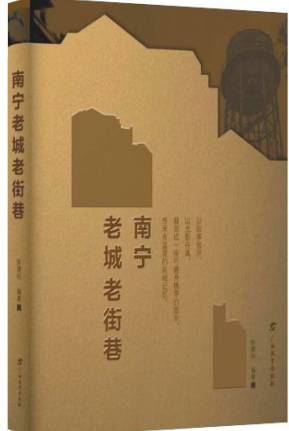
《愚园路传（1860—2025）：从江南水乡到网红街区的空间变迁》
上海人民出版社/上海远东出版社

作者徐锦江以愚园路为微观空间切片，串联起从江南郊野到社会主义社区改造，当代网红街区更新的层层空间印记。书中兼顾史料考据与市井故事，让读者读懂一座城市持续生长、不断层叠的历史。



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（1950—2000）》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王笛以1950年至2000年的成都茶馆为观察窗口，聚焦茶客、茶馆经营者、曲艺艺人等普通人，记录茶馆半个世纪的起落浮沉，窥见时代变迁下市井文化的重塑与复苏。书中展现了地方民俗坚韧的生命力，为城市公共生活研究提供了细腻鲜活的样本。



《南宁老城老街巷》
广西教育出版社

本书作者以街巷为载体，踏遍残存的老街，记录骑楼、古井、老店与寻常人家，把街巷建筑变迁、民俗旧事、市井人情熔于文字，以行走式叙事，留住老城空间里鲜活的微观生活。它既是老城影像与人文的留存，也提醒读者：街巷承载城市根脉，老街保护，守护的正是一座城独有的精神底色。